

足迹

我带你去取红酒

□ 陶黎明

在西雅图小住的那段日子,偶尔下午回来得晚,懒得回屋做饭了,我就会和利在公寓酒店一楼的自助餐厅解决晚餐。

周四的那个下午,我们从联合湖回来,天色将晚,浑身冰冷,看到热腾腾的餐厅毫不犹豫就进去了。正吃着,利问我:“妈妈,你要喝一点红酒吗?”“啊,好呀。”虽然不胜酒力,但还是嗜好这一口:“有红酒吗?”“喏,那边角落里站着的,她面前有个冰桶,就是等着需要红酒的人过去,她会给你斟上一杯。”“哦,太棒了,你去帮妈妈取一杯来,一点就好。”“我带你去取吧。”他站起来。“为什么要这样?”“因为我还不到允许饮酒的年龄呀。”我乖乖跟着他取了红酒杯,在服务生的微笑中倒了半杯红酒。回到桌上慢慢品味的时候,想着现在的孩子,哪里看得出来是18岁还是20岁呢?于是我问利:“刚才如果你去取酒,估计那个服务生也看不出你的年龄。”利很认真地告诉我:“有没有达到饮酒年纪,我自己知道呀。”

其实,我知道这个孩子一定会给我这个答案——一个将规矩视为自觉的孩子,在每一件小事上都有自己的评判标准。也许,从某种角度上看是懂得变通,但在一个强调规则的现代社会,这却是最基本的要求。

记得刚来那几天,他放学后我们一起逛

街。西雅图的马路并不宽阔,车辆也不是很多,三五步就能走到街的对面。遇到每一个街口的红绿灯,在没有车辆通行的情况下,我总是对闯红灯跃跃欲试。但是,利总能看透我,对我说:“不要,这样太没素质了。”他看我对素质的理解跟他有偏差,就开始吓唬我:“你闯红灯,在西雅图要是被警察抓着,是要罚款的哟。”有时在寒冷的夜晚,等在几乎无车的街口,我要一再地告诫自己不可以,不能让他看到自己屡教不改,以此来打消闯红灯的想法。

我们去艺术博物馆参观,买票的时候,利告诉售票员自己是学生,于是,我们就买到一张成人票和一张学生票。“她不用看你的证件吗?”我有点儿不明白。“不用,我会说实话,她也会选择相信我。”

我们前一晚买了两颗装饰用的珠子,配利的手链。第二天,他说细想还是觉得贵了,也不是太喜欢,要去退掉。“啊?那怎么办?昨晚妈妈是用借记卡买的,不是信用卡,退不回卡上。”我跟他到了那家店,他把两颗珠子拿出来递给店员(不是昨晚接待我们的那个店员)说:“我要退货,因为,我不喜欢它们了。”店员检查了珠子没有瑕疵,接过昨晚的付款单,开始在电脑上操作,然后,将一沓美元交给了利——是的,钱不能退回借记卡,就退现金给我们,没

有质疑刁难,就这么简单。

这些以前对我来说几乎是不太可能的事情,如今在我眼前自然而然地就发生了。白天利上学去了,我一个人静静地待在房间,就会去想利从过于严谨的循规蹈矩中获得了什么。这几年,几乎每年都会听到他说有中国同学被劝退,并不是因为成绩不好,而是因为不能很好地遵守规定。比如,一个孩子对学校的禁烟令不当一回事儿,一而再再而三地犯禁,于是,就没有第四次了;另一个孩子,外出要么不请假,要么晚归,明知故犯,也被劝退了。

什么是自由?自由就是在不影响别人、遵守规矩之外,你的思想和行动不受约束——留长发,涂五彩的指甲油,谈一场未成年的恋爱,甚至成为一个流浪者,都是被允许的。自由还是,在没有人证、物证的情况下,别人会选择相信你。

这样的自由,我想没有人不喜欢,但它的基础是,没有人怀疑我的年纪,而我自己知道未到饮酒年纪就不能去取酒;即便你横穿马路没人看见,你也肯在寒风里耐心等待几十秒。

对规则自觉地遵守,使年幼的心灵受到应有的指引,是行为教化的必然,也是这个社会人人都应该明白的简单道理。

好吧,带妈妈去取红酒。

我讲个笑话,你可别哭啊

□ 姚瑶



纯属谣言

多年前,采访一个在国内设计比赛上获奖的大学生。与他闲聊,聊及感情生活,问他有什么难忘的事,他想了许久,忽然一拍大腿:“有件事特别好笑。”那时他刚进大一,喜欢一个别院的女生。有一次在楼道里遇到她,他忽然鼓起勇气说:“你放学能不能等我一下?”结果那女孩一笑,说好啊,你在教室等会!

“结果你猜怎么着?”他憨憨笑起来。他说:“我在教室傻等。一会儿就听见楼道里哗啦一声巨响,楼道的卷帘门关了!我就在教室过了一夜,哈哈哈哈哈……”

一个18岁的男孩,因为喜欢的女孩子随便的一句话,就在教室等了一晚,这件事在我看来一点也不好笑,但在他的心里,这些有些心酸的往事已经成了一个笑话。

我爸也是那种可以将悲伤的故事当笑话讲的人。有一天看着电视,他忽然说:“你知道吗,有件事特别好笑。那年我在部队当兵,你奶奶有一天想我想得不行了,也没跟家里人说,就跑到长途汽车站去,开始见人就问‘河南的车来了吗?今天有没有河南来的车呀?’别人都把她当神经病,你说她怎么会做出这事来呢?”

常听人说,人生就是一个从风起云涌到云淡风轻的过程,时间就像一堵墙,墙内风起云涌六十载,墙外风平浪静一瞬间。看着他的侧脸,我忽然想起小时候和爸爸妈妈两地分居,开学前他和妈妈送我上车,我哇地一声哭了,死活不肯走,他安慰我说:“爸爸妈妈不走,就在这守着,等你放暑假来,一下车就看到我们了。”

只是,我没忍心讲这个笑话给他听。

意境

底气

□ 子沫

董桥写沈从文,说他临摹汉碑,练隶书一练几十年,写了一辈子字不觉得自己是书法家;说沈20世纪30年代在北平写《边城》,院落里有槐树、有枣树,每天朝阳初上,他坐在小竹椅上据着红木小方桌静静地写,每星期只写一章。“情致那样闲淡,难怪沈先生真是连写字都不屑‘向世味上更浓一番’。所谓慢,所谓底气,就是这么来的。”那方红木小方桌,也是一片旧时月色吧。



闲话

做个能讲出细节的人

□ 沫沫

几年前,一位友人曾对我说:“我去了七次凤凰,将来老了,我还愿意穿一件红衣裳坐在沱江边喝一杯自己亲手煮的奶茶。”她说到冬天,凤凰的人很少,她在吊脚楼上吃火锅,漫天的雪飘飘扬扬,红灯笼,热气,雾气……这样的细节,有审美的成分,我一直记得。对生活的热爱是通过细节表现出来的。现在,太多的人会说,我去了哪些地方,花了多少钱,用什么相机拍了什么照片……但是,他们一个细节都讲不出来,他们说的你一句也记不住,因为没有真正的热爱,只有炫耀和跟风。

我记得最让人悲伤的一个细节是三年前一位朋友讲的。那段时间,她妈妈刚去世不久,她说:“我开着车子走在深南大道上,儿子坐在车后。开着开着,我突然控制不住情绪,只得把车停在路边,趴在方向盘上泣不成声。儿子在身后怯怯地问,妈妈,怎么了?我静静地说,我想我妈妈了……”这个细节让我忍不住潸然泪下,友人后来对我说:“趁父母在时,好好待他们吧。”那天下班,我就回了父母家,陪他们吃了一顿漫长的晚餐,慢慢吃,慢慢聊……

前段时间与一位长辈聊天,他谈起自己的女儿。他说女儿上小学、中学时他从未接送过,但是上了大学后,他反而每个周末送女儿上同城的大学,这成了一件让他愉快的事。为什么?因为一路上可以聊天,什么都聊,边走边说,一两个小时的步行,他很享受这个过程。路上有风吹,有鸟叫,有甜品铺,还有青春的女儿神采飞扬的表情……类似的是在一个多人饭局上,听某位男士聊起自己刚上大学的女儿。他说暑假时,他每天最快乐的事是陪着女儿看一档电视节目,房间里开着空调,父女俩坐在地板上吃着瓜子评头论足,他觉得很满意很特别很惬意。假期结束,女儿要回上海,他第一次有一种浓浓的离别伤感,不敢去送别,而是让孩子的妈妈去送……讲这段话时,他的眼睛湿润了。这些细节我一直记得,父亲的深情,有时旁人看着,也是感动的。这个世界再怎么喧嚣、浮躁、动荡、变迁,还是有无可替代的深情和简洁纯粹的爱存在。

相信点什么,保持某种天真,做个能讲出细节的人吧。

态度

“思想偏激”的大学生太少了

□ 金宰贤

前段时间,一则关于北京大学的新闻引起了人们的关注:北京大学将在全校实施对十类“重点学生”进行学业会商的制度。这十类中还包括“思想偏激”的学生。当我听到这则新闻时,觉得很奇怪:到底什么叫思想偏激?

由于在中国待的时间不长,我接触过不少中国大学生。我认为,在中国大学里,“思想偏激”的人太少。这不仅意味着社会缺乏创造力,还会导致社会缺乏集体智慧。

集体智慧是在思维百花齐放的时候,最容易展现的。换言之,人们想得越不同,集体智慧越多。

这则新闻也让我想起以前一位汉语老师给我讲的一个故事。

2008年,一个纽约大学的华裔学生利用暑假来到北京。他觉得这几年中国

经济发展得非常迅速,以至于使他担心在美国学习的自己未来能否具有竞争力。他想借此机会,亲眼验证中国大学生的实力,同时学习汉语。

在北京待的两个多月里,他学得十分用功,并且有空就找机会跟很多中国大学生交流。当他离开中国的那天,表情显得非常轻松,一点也看不到初来中国时的顾虑。汉语老师问他为什么显得这么开心。他回答:“中国大学生没有创造力,我不用担心了。”

在我看来,很多中国大学生比美国名校学生还要厉害。那么,中国为什么很多领域还不如美国呢?美国是鼓励大学生独立思考的国家。如果你想跟普通人不一样,没关系,你去想吧,只要不损害他人的利益就可以了。中国呢?——“你思想太偏激。”

分析

红楼“首席员工”因何遭遇职场滑铁卢

□ 红颜

如果把贾府比喻成一个大集团公司,那么,晴雯可以说是这家公司的货真价实的首席员工。按道理说,这么一个有后台又有才有貌的“白领丽人”,在职场的发展空间应该是非常大的,可晴雯硬是在贾氏公司混不下去,最后被扫地出门,为何呢?

一、话语尖酸刻薄、不留情面

晴雯算得上是贾氏集团公司中最具个性的一名员工,她经常借机讽刺挖苦同事,根本不拿部门经理贾宝玉当干部。

一次,宝玉踢伤了袭人的胸口,袭人被踢得吐了血。第二天,当晴雯因小事顶撞上司时,同事袭人出言劝解,她不但领情,反而言语刻薄地讽刺袭人,在她伤口上撒盐:“自古以来,就是你一个人服侍爷的,我们原没服侍过,因为你服侍的好,昨儿才挨了窝心脚。”宝玉有一天帮丫鬟麝月打理头发,晴雯挖苦麝月:“交杯酒还没喝呢,这就开始上头了!”,把麝月讽刺得灰头土脸。

不但对同事说话夹枪带棒,就是对薛宝钗这样的重量级人物,晴雯说话也非常刻薄,面对前来看望贾宝玉的薛宝钗,晴雯居然当面说:“有事没事跑了来坐着,叫我们三更半夜的不得睡觉。”薛宝钗当下被挖苦得留也不是走也不是。

晴雯平日总是以尖酸刻薄的语言对同事说话,甚至连领导的贵客都不放在眼里,挖苦讽刺,这不能不说是她职场失败的一个要因。

二、随意逾权越职、挑战权威

一次,宝玉房里一个名叫坠儿的低级小丫鬟偷了王熙凤非常贵重的首饰——虾须镯,案子破了以后,晴雯动用私刑,还生生地把坠儿撵出了贾府。

坠儿作为宝玉房中的低级丫鬟,偷了总经理王熙凤的贵重物品,是报官还是开除,王总可以决定,作为部门经理的宝玉也可以发落。结果,总经理和部门经理都还没有说话,作为老员工的晴雯居然对人家又动私刑又驱逐,做了与自己职位不相符的事,以至于大家都认为她胳膊伸得太长,不知天高地厚。这样的行为显然不符合自己的身份,难免遭人非议。

三、过分倚仗后台、积怨甚多

晴雯虽然工作能力强,但却不怎么认真做事。有同事批评她是“装小姐”,她居然宣称:“等你们都去尽了,我再干也不迟。有你们一日,我且受用一日。”同事知道她有后台,都拿她没有办法。所以,当副董事长王夫人责怪晴雯是狐狸精,要把宝玉教坏的时候,平时晴雯得罪的一帮人开始秋后算账,对她落井下石。

俗话说:晴天留人情,雨天好借伞。像晴雯这样过分依赖后台,平时做事不为自己留后路,积怨太多的人,得势时同事们可能还会让其三分;一旦失势,想想平日里她对大家的态度,又有谁愿意帮她呢?当她所倚仗的靠山被别人轻松搞定之时,也就是她职场末日到来之际。